

汉晋时期的金玉带扣

褚馨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上海博物馆的白玉龙纹鲜卑头的形制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牌饰,工艺上仿制同时期的金银器,同时采用了中原汉民族喜爱的玉料和纹样。汉晋时期金玉带扣的外形经历了由长方形到前椭后方形的转变;同时,这一时期金玉带扣的材料、制作工艺及设计上也反映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汉晋时期 带扣 玉器 金器

中图分类号:K876.4

文献标识码:A

汉晋时期圆首长方形、有活动扣针的带扣基本采用当时的珍贵物料,如金、银、玉制成,有时并镶嵌以华丽的宝石作装饰点缀。相对于中原传统的腰间扣结工具带钩而言,带扣的普及性不高,但其多数制作精美,工艺讲究。本文从考证上海博物馆的白玉龙纹鲜卑头入手,进一步探讨汉晋时期金玉带扣的演变,分析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带扣的材料、工艺及设计上的体现。

一 白玉龙纹“袞带鲜卑头”

上海博物馆玉器展厅陈列着一件玉质洁润、制作精美的透雕龙纹玉牌,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带有铭记的魏晋南北朝传世玉器。牌呈长方形,长9.5、宽6.5厘米,三边窄框,框内透雕一龙纹,作俯首攀爬造型,龙身扭曲成波浪形,细尾分支,卷曲下垂。与一般张牙舞爪的龙纹相比,此种俯首的

造型并不多见。上手观察此件玉器,可领略其精湛的琢磨工艺:龙颈腹部排列整齐的鳞纹,腰部为细格纹,尾、鳍、爪则以长阴线条表现纹理,龙眼内凹,闭嘴扣齿,五官琢刻精细(图一)。此外,龙躯均匀排布二十余处细孔,腰部中央留有一圆形凹槽,这些设计应是供镶嵌宝石之用,现宝石无存。玉牌的背面平整无纹,上下边框由右至左竖排刻写了两行蝇头铭文,共计46字,分别为:

庚午,御府造白玉袞带鲜卑头,其年十



1



2

图一// 上海博物馆藏白玉透雕龙纹鲜卑头

1.彩插 2.背面铭文拓片

收稿日期 2011-04-25

作者简介 褚馨(1979~),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玉器、六朝文物与艺术。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2011年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科研启动资金资助。

二月丙辰就,用功(工)七百。

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

字体隶中带真,符合六朝时期书体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风格^[1]。由于边框细窄,仅0.5厘米宽,其上琢刻文字实属不易,故字迹纤细柔弱。边框共钻9个细孔,应为缝系革带之用,观察其制作痕迹,应是先钻孔而后刻字。两行铭文提供了较详备的信息,可知器物名称为“白玉袞带鲜卑头”,制作机构是“御府”,完成日期是当年十二月的丙辰日,耗用人工“七百”,以及三位督造官员姓名和相应的职官名称。这种铭记方式在魏晋南北朝玉器中只此一件,其他时代的玉器亦不见。

据器型及纹样分析,透雕玉牌是一件残品,缺失了右侧边框、龙纹前右肢、一侧龙角和龙须,残损边缘已打磨平整光滑,无断裂痕迹。相应地,可推测其背面的文字内容亦是不完整的:句首以“庚午”直接起句,无国号、年号等具体纪年信息,下行的“将臣范许”与后文两个督造官比较,未交代有详细的职官名称。由铭文缺失而引发对这件玉器具体年代的讨论,早有孙仲汇、王正书先生考证,分别认为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1年)及东晋废帝太和五年(371年)的遗物^[2]。两者虽结论不一,但对开首“庚午”二字的解读,均视其为记录年号之用。而张尉先生在新近文章中,运用六朝碑刻中的纪年格式和表达习惯,否认了其纪年的可能性,提出这里的“庚午”记录的是日,而非年月,前面应补上“某某年号+某年某月”^[3],笔者赞成此观点。古人按照干支纪年、月、日的顺序习惯记录具体时间,并讲究前后文的对照呼应关系,鲜卑头铭文交代完工时间为“其年十二月丙辰”,“庚午”对应的是“丙辰”,所以相应记录的是日,并非先前学者讨论的纪年之用。因此,试图通过此前提来推断鲜卑头具体时代的论证缺乏说服力。

尽管未能直接根据铭文解决玉器的具体年代问题,但这些文字仍包含了相当丰富、可供解读的信息^[4]。有关魏晋南北朝玉器的制作机构,很少有资料披露,铭文中提到“御府”一词,这是关于六朝玉器作坊的一条重要资料。文献记载秦汉之时宫中已设置“御府”机构,与“尚方”均是皇家度藏珍玩的场所,如《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属官也,掌珍物。”又如《后汉书·吕强传》:“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但两者分工略有差异,“御府”主要掌供宫廷金帛乘舆器

服,“尚方”则是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5]。魏晋承汉制,依旧设置御府,仍是宫廷收藏宝物之地,《三国志·魏书·王观传》:“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晋书·武帝纪》:“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这些文献都是这方面的记录。当时的御府属“少府”管辖,而少府令作为九卿之一,其职能是专掌宫中御服珍膳^[6],这从另一个侧面也确定了御府的工作范畴。

文献中反映六朝时期御府的主要职能是为朝廷准备礼仪时的各类御服冠帻^[7]。但事实上,御府也有专门的工匠,会参与制作金银杂物,这在一些文献中亦有记录,如《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晋书·何遵传》:“性亦奢侈,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虽然与专门作器的尚方机构^[8]相比,这似乎并不是它的主要职能,但御府仍具备制作珍玩的工巧能力和器具装备^[9]。上海博物馆所藏透雕龙纹玉牌,玉料上乘、制作精美,为御府所造,而非尚方所出,并不出奇。因为该器自铭“袞带鲜卑头”,袞带即袞服的腰带,袞服是天子祭祀时所穿绣有龙纹的礼服,以彩锦织成。“鲜卑”二字,即“犀毗”、“师比”,泛指胡带之扣具,暗示了这种器物的外来因素^[10]。此件透雕龙纹玉牌即是礼服腰带上放置于前,具有扣结功能的带具,所以它并非一般的珍玩杂件,而是与隆重华丽的宫廷御服冠帻配套使用的腰带饰物,出自御府之工,正符合了上述文献记载中的机构职能范畴。

“御府”二字提供的另一个信息是有关鲜卑头的年代问题。据文献记载,御府在三国时期属少府管辖,从晋朝开始改属“光禄勋”之下,至东晋被废^[11]。而玉器铭文中提及监造官是“奉车都尉”,这一官职是皇帝参乘的侍从官,属光禄勋管辖,并在晋以后日渐废除,“晋以宗室、外戚、勋旧大臣任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并为奉朝请,犹有汉时遗制。晋以下,其职日见寝废”^[12]。因而,从文献层面上考察,这块白玉鲜卑头是早于东晋时期的制品。

白玉鲜卑头上的刻字,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关注玉器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在延展性好的黄金制品上篆刻文字,或在青铜器上铸长篇铭文遗之子孙宝用,或于陶瓷器上直接题诗作画、书写镇墓驱鬼之文,在坚硬的玉石上琢刻文字并非易事,因而中国古代玉器上很少出现文字。如鲜卑头般留下详细资料的玉带饰更是稀少,目前仅见另一例为五代十国时割据四川的前蜀王建墓(又称“永陵”)出土的玉腰带,其“獬尾”(自铭,即鉞尾)



图二// 四川王建墓出土鉈尾正(龙纹)、背(铭文)面拓本

背后镌刻长篇铭文,记录了玉带制作的缘由(图二)^[13]。文字皆阴刻,楷书,笔划粗而有力,字迹工整但笔锋的提按顿挫并不明显。比较之下,同墓出土玉册的文字明显清秀端正,笔力较好。玉册刻字胜过鉈尾之字,因为其质地并非真玉,而是珉玉,系现代所称之白色大理石,质软而粗,较易刻划^[14];另一原因是由于玉册是一种礼仪、祭祀性的文书,其功能和意义在于宣扬上面的内容,故字迹的端秀清晰不容忽视,因而会设立专门的机构和职官^[15]。永陵鉈尾、上海博物馆鲜卑头均因临时记录一些纪念性事件而留下铭记,制作带饰的玉工擅长纹饰的雕刻、构件的琢制,并不一定工于刻字。同时,之所以选择在带扣、鉈尾上作长篇铭记,亦能反映这两种构件在整条腰带中突出而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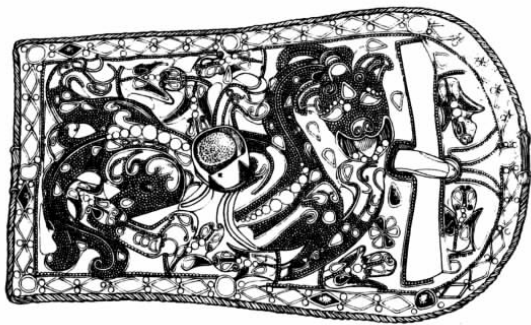
二 刘弘墓龙纹金带扣

上海博物馆白玉袞带鲜卑头年代的进一步判断,需要借助魏晋南北朝另一件同形异质的出土物。1991年发现于湖南安乡西晋荆州刺史、镇南将军刘弘墓的嵌宝石龙纹金带扣,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图三)^[16]。带扣长9.2、宽5.1~6.0、厚约0.3厘米,重仅50克,形制保存完整,整体呈圆首长方形,前端较宽,转角稍圆作弧状,后端较窄,右侧竖开一长条形方孔,孔中横置一0.7厘米长的活动扣针。从重量上看带扣很轻,上手观察后方知其中奥秘:其实际为一层薄薄的镂空金壳,包裹于革带

上,革带已腐,能看到背面衬着的细十字形麻布底纹。带扣四周有框,扣面饰一条镂空龙纹,由掐丝、焊缀金珠和镶嵌工艺完成制作^[17]。精致细密的金珠和盘绕错致的金丝塑造了生动的龙纹形象:龙首右向,双眼内凹,张嘴吐舌(舌可以活动),作四肢爬行状。龙身中央有一孔柱,镶嵌着一颗大绿松石,而遍布龙身、龙眼及边框上大小的各类圆形、水滴形、花朵形凹槽,原本也嵌有各类宝石,现已斑驳脱落,所剩无几。可以想象,金带扣原本是一件金翠相应、装饰华美的艺术品。

通过风格分析我们发现,刘弘墓的这件金带扣,除局部龙纹稍异外,整个纹样内容、设计,甚至包括宝石镶嵌的排布位置,与上海博物馆的白玉鲜卑头几乎如出一辙,两者的相似程度令人惊异。据史料记载,刘弘于西晋光熙元年(306年)秋八月卒于襄阳军中^[18],随葬的金带扣制作年代下限是公元4世纪初,因此,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玉鲜卑头也应属同一时期的工艺品,且是西晋时期以玉仿制金银器的产物,这与上文从铭文内容角度初步断代的结论相符。

出于对某种造型或艺术纹样的喜爱,用不同质感的珍贵物料加以体现,是中国古代艺术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从西晋这两件龙纹带扣中我们看到了“金玉同盟”的影子^[19]。早在公元前7世纪



图三// 西晋刘弘墓出土嵌绿松石龙纹金带扣



图四// 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塔墓出土汉代龙纹金带扣



图五// 朝鲜乐浪石岩里9号墓出土汉代龙纹金带扣

至前6世纪的东周时期,玉器的制作和装饰可能受当时青铜铸造或外来金器工艺的影响而发生了较大改变,表面出现大量浮雕、透雕以及繁密的谷纹、蒲纹,追求与铜器、金器一样表面熠熠生辉的艺术效果^[20]。作为一种软金属,黄金的延展性好,可塑性强,容易做透浮雕,并施以繁复细密的工艺,因此表现同样的主题时,可做到更为精细和丰富的层次感。然而这些技法在坚硬的玉石上较难完成,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龙纹图像在玉质的带扣上艺术表现力相对薄弱,但这并不影响两种物料诠释同一主题时展现出的不同风格:黄金的华丽和玉的温润细腻。

类似刘弘墓出土的这种圆首方尾,有扣孔、附活动扣针的金带扣,是汉晋时期社会高等级贵族拥有的豪华型腰饰工艺品^[21]。它在西汉时已制作精熟,多见金银质地,如新疆焉耆柏格达沁古城黑圪塔墓地出土的龙纹金带扣,重量相仿(48克),金薄片扣面上锤揲出八条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龙。其中一条龙为主纹,起伏于中央,四周围以小龙,龙身与水波纹由纤细如发的金丝焊接而成,缀以细密金珠,并多处镶嵌水滴形红、绿石珠(图四)^[22]。同样形制大小相似、华丽繁复的群龙纹装饰亦见于朝鲜乐浪石岩里9号墓的金带扣(图五)^[23]。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的银质带扣,扣面中央锤揲出一翼虎,昂首翘尾,右前爪持一树枝状物,四周围绕山石或云气纹。虎的双目用橙黄色玻璃珠镶嵌,虎体篆刻细纹,局部有错金痕迹,并伴零星的绿松嵌石(图六)^[24]。带扣的虎形象威武不失可爱,与北方凶猛厮斗、充满动感的虎形象不同,但又有着一对羽翼,可能是模仿北方风格的汉地制品^[25]。近年在云南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发现一枚带扣,由金片模压凸起一条穿云龙,占据扣面主体位置,身上

刻细密鳞纹,三角形眼嵌玻璃珠,龙头下侧立一虎,眼亦作镶嵌(图七)^[26]。其龙的形象属中原汉式,而龙身下的虎,虽个体短小,但前肢抬立,张口咆哮,凶猛好战的形象带有滇文化因素。

金银器是珍贵物品,容易被人们珍藏保存,也容易传播^[27]。从上述发掘材料看,汉时期这类制作精美的金银带扣见于新疆、朝鲜、云南等汉文化的边境地区,它们在当时是臣服于中原王朝的郡地:新疆焉耆是扼天山南麓丝路之咽喉的西域“焉耆国”;平壤乐浪地区属汉“乐浪郡”,出土金带扣的石岩里9号墓中包含了诸多汉文化因素^[28];云南石寨山墓地亦出土了西汉王朝赐封滇王的蛇钮金印^[29]。因而,带扣图案中出现有中原文化风格的汉式穿云浪龙、群龙纹不足为奇。同时,这些西北、东北、西南边陲地区亦是游牧民族杂居之处,带扣上精湛的掐丝和金珠等细金工艺,配以“青碧、阆瑰”的宝石镶嵌手法,应受自北方少数民族金银工艺的影响,因为掐丝与金珠工艺在中国出现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首先是在游牧民族地区流行,中原地区在西汉时才有,东汉六朝兴盛^[30]。

用外来的细金镶嵌工艺装饰、表现中原熟悉的题材,金银带扣上出现的这种新理念成为了当



图六// 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汉代虎纹银带扣



图七// 云南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采集汉代龙虎纹金带扣



图八// 南京仙鹤观东晋高愷墓(6号墓)出土镂雕蝉纹金玦

时贵重工艺品设计的一种时尚,传入中原后很快被皇室贵族们接受并流行起来,从而进一步启发了汉地工匠的创作灵感。江苏徐州汉彭城王刘恭墓出土的鎏金嵌宝石辟邪式砚盒^[31],河北定县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通体满缀大小金珠,镶嵌红、绿宝石的掐丝金辟邪、金龙头、金羊群等^[32],均可视作外来细金镶嵌工艺影响下的创新之作,题材和器物形制却保持了中国传统的风格。魏晋时期墓葬中经常出现的镂雕蝉纹金玦,布满了细小金粟粒,蝉眼内作镶嵌,亦是这种工艺在公元4世纪的延续和影响(图八)^[33]。

上述提及的金银带扣,均出土于汉代的边境之地,这似乎容易给人以错觉,这类制作精美的贵重腰饰品并非汉人所好。其实不然,此类金银带扣传入中原后,应是被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因为汉地发现了仿制这类形制的玉带扣。河南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出土了一枚玉带扣,灰白色玉,造型与金银带扣一致,圆首长方形,有弯形扣孔,扣孔

一侧有圆形凹窝,另一侧针形槽,应是嵌置活动扣舌的,扣舌遗失^[34]。扣面浅浮雕两条蜿蜒曲折的螭虎,作穿云攀爬状,背面平滑光素,分布十处牛鼻穿(图九)。另一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形制相近,纹饰更加错综复杂,浮雕龙、龟、螭、雀等各类灵兽动物,昂首穿行,与四周盘绕的巨浪融为一体(图十)^[35]。玉带扣并非汉代玉器的典型品种,由于材料物理性质的不同,加工上有难易之别,故玉质带扣的纹饰相对简化许多。另一方面,扣面的主题图像不见金银带扣的翼兽、猛虎之形,而换成中原流行的穿云龙、螭虎或灵兽图案。形制上的保持,但物料和纹样的改变,体现了南方中原之民模仿、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带扣,将其转化为自己熟悉和喜爱的玉制品的过程。

西晋刘弘墓龙纹金带扣的出土,以及上海博物馆白玉鲜卑头的存世,说明这类制作精美的金玉带扣一直延续到了公元4世纪,其造型上继续保持着圆首长方形、弧形扣孔、活动扣针等特点,但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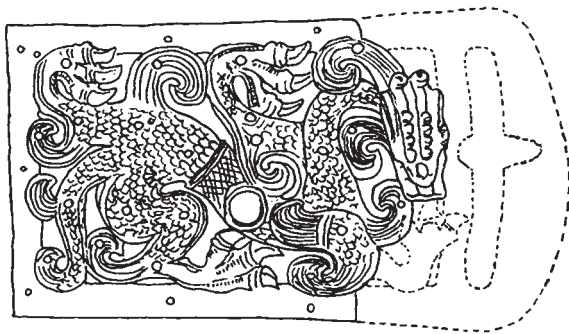
2

图九// 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出土龙纹玉带扣

1.正面 2.背面



图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代玉带扣



图十一// 上海博物馆藏白玉龙纹鲜卑头复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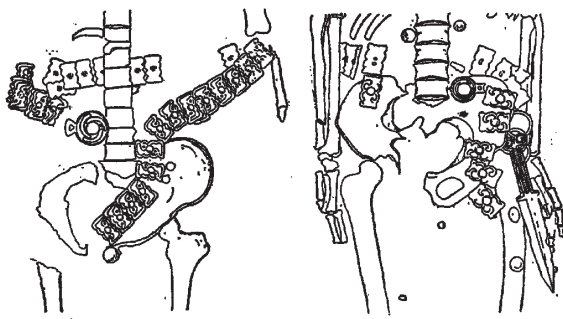
与前代出土物相比,具有更明显的汉化因素以及工艺上的进步。首先,汉代的金银带扣多采用平版锤揲技术,即将金料锤揲成薄片,再锤或鑿图案,此技术可制作出较大凸凹起伏的纹样。而刘弘墓金带扣采用了工艺更为精细的镂空技术,龙纹由细丝堆砌而成,满缀金珠,形成立体的透雕状。相应的,据此仿制的上海博物馆白玉鲜卑头是透雕而成,这在汉代玉带扣中未曾见到。其次,扣面图案选择了独立的游龙,且龙躯中部镶嵌一颗较大宝石,使图像出现了明确的中心。再次,图像的布局发生了改变,汉代金玉带扣上的主题动物均在右侧,扣孔开在左侧,而刘弘墓金带扣变成了动物左侧,扣孔右侧。即使方向上发生了改变,但汉晋带扣中的动物总是面向着扣孔而立,这个设计始终保持未变。由此,我们可以复原上海博物馆的白玉鲜卑头,应是一枚圆首,龙纹右向,右侧开弧形长孔的带扣,扣孔上有一枚活动扣针(图十一)^[36]。这样的玉带扣虽自铭“鲜卑头”,沿用北方民族的惯用称呼,但物料的选择、龙纹的设计、制作的机构,包括其铭记方式,已经完全中原化了。所以,公元4世纪保存下来的这两件一金一玉的带扣,是当时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型器物,它们既传承了北方民族的形制和工艺,又渗入了中原的传统审美观念,是马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汉化工艺品。

三 北方系统中的带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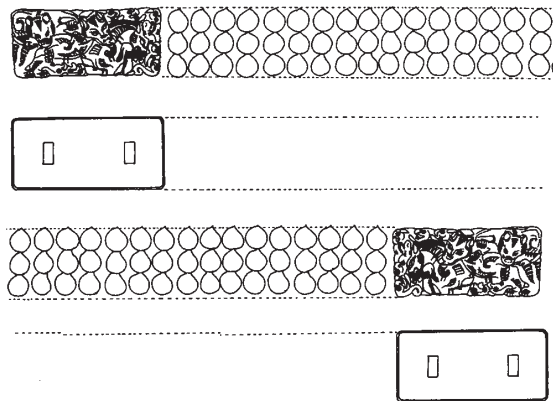
作为古代革带上的扣结工具,带扣的形制多种多样,各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样式,并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方、中原及南方地区,其最初起源并不限于某地某时。考古材料证明,带扣性质的扣结工具在中原和北方的始出年代基本接近,且南北两套系统的演进都有着较为完整的序列,孰早孰晚,难以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原地区的带扣起初用

于马具,而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带扣一开始便用于人身束带功能^[37]。公元前6世纪,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的内蒙古匈奴文化重要遗存——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墓地均出土了一种圆形的死舌带扣,每条带只出一枚,这是北方民族最早期的带扣形制。在凉城毛庆沟匈奴墓43、46号墓中,可以看到这种圆孔型带扣放置于墓主腰间,四周围绕着成组铜饰牌,构成了完整的腰带形制(图十二)^[38]。学者根据残留的革带将其扣结方式复原如下:将一端固定,带头的另一端打孔若干,使用时从圆孔一侧穿过,根据长短需要将孔嵌入扣舌,再往回拉,绕住带头后套入固定。

至公元前4至前1世纪,泛匈奴地区开始普遍流行一种长方形边框的青铜或金质牌饰,通常成对出土于墓主腹部,牌面上铸出各种动物相斗或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纹样,数量非常庞大。它的分布不只限于鄂尔多斯地区,在我国境内,北起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南到鄂尔多斯地区,东起辽宁西丰,西至宁夏固原,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内均发现风格一致的青铜牌饰。从族属方面说,除匈奴外,生活习俗接近的东胡后裔和鲜卑也使用这种带



图十二// 内蒙古凉城毛庆沟匈奴墓出土腰带位置图



图十三//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
出土金扣缀贝腰带复原示意图



图十四// 湖南长沙咸家湖曹孺墓出土白玉带扣一对

饰。乌恩指出:这类被称为“鄂尔多斯式”的牌饰,其中一部分“不仅具有装饰意义,而且具有同带扣一样的实用功能”,前苏联叶尼塞河中游克麦罗沃乌金科湖畔5号墓出土一块毛织品,其上附有残皮带,皮带上固定一长方形双牛纹牌饰,就是有力的证据^[39]。由于这类器物纹样复杂,观察者有时忽略了其扣结腰带的功能,而把它们当作单纯的饰牌,其实它们边缘铸有尖小的扣舌和穿带子用的孔,只是有的长期使用被磨损,扣舌变得不甚明显,穿带之孔小于其他形制,有的已磨得光滑而偏斜,留下曾被长期使用的痕迹。

盛行于草原文化地区的这类长方形牌饰,对汉代的中原腰带产生了重大影响。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扣缀贝腰带,带扣为一对浓郁北方风格的猛兽咬斗纹长方形牌饰,由金片锤揲而成,背部有两个环钮,与海贝、金花等腰带组成部分缀于丝织物上(图十三)^[40]。这类精美腰带未见于中

原地区,可能作为异域珍品直接从北方流入中原王室。广州南越王墓的龙龟纹鎏金铜带扣及铜边框内镶嵌浅蓝色玻璃以代替动物纹样新型带饰的出现,尚属首见,暗示了少数民族的工艺或已逐渐传到南方,并被仿学和吸收^[41]。而湖南长沙咸家湖曹孺墓主人腰部出土的一对洁白细腻,琢工精致,左右相向而对玉带扣,透雕动物似为骆驼形象,驼峰变成了飘动的云,似代表某种北方文化的气息,表明中原地区已经完全接受来自马背民族的透雕牌饰,并用自己喜爱和熟悉的玉材料加以制作和演绎(图十四)^[42]。有趣的是,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存有制作类似长方形动物纹牌饰的模版,可用作大批量生产鎏金铜饰,可见这种纹样在当时十分流行^[43]。

考古中亦有些材料,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传统审美的双重因素。如汉广陵国辖内的江苏邗江甘泉“妾莫书”墓出土的一块鎏金铜牌,长8.5、宽3.8厘米,四周为粗犷的鄂尔多斯风格鎏金铜边框,牌面中心却镶嵌着透雕的穿云龙纹玉片,右下角还有修补玉片的痕迹(图十五)^[44]。这种南北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例子亦出现在北方墓葬中,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的墓主是一位匈奴女性贵族,入葬时佩戴华丽的头饰和项饰^[45]。她耳间垂挂的一对金玉耳坠颇具特色,上端凸字形



图十五// 江苏邗江“妾莫书”墓出土嵌龙纹玉鎏金铜牌饰



图十六// 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出土金玉耳环

金牌,内用金片捏制鹿形动物纹,原应有镶嵌,现脱落;下端为包金玉坠,两侧垂金串珠。玉坠呈椭圆形,通体镂空,并阴刻纹饰,一件作螭虎纹,一件作龙纹(图十六)^[46]。此类金玉耳坠在中原地区未曾发现,连珠纹、镶嵌工艺似受西域文化影响,而龙和螭虎纹,明显带有中原文化因素。将金和玉组合起来设计,可能是当时匈奴贵族一种流行的首饰风格^[47]。华与夷两者之间的工艺交流,在让步和接纳的融合过程中,其纹饰图案、装饰手法、甚至有时连材料成分的比例都需要达到双方民族均可以接受的,合理又合适的程度^[48]。

四 总结

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到战国晚期北方的青铜牌饰带扣依外形轮廓已发展出三种形制:长方形、刀把形和前椭圆后方形^[49]。从汉代开始,带扣逐渐变成活舌,扣身也由先前的长方形、刀把形渐渐变成固定的前椭圆后方形,特别是两晋时期,基本开始流行前椭圆后方形。西晋刘弘墓的金带扣,上海博物馆白玉鲜卑头,正属于这类前椭圆后方形的造型。带扣用于人体束带,北方比中原有更久远的历史,中原传统用的是带钩。到了东晋时期,带钩和带扣还是并存使用的。就魏晋南北朝出土的情况而言,玉质带钩的数量和分布比带扣更加广泛,如发现透雕龙纹金带扣的西晋刘弘墓中,带扣与另两枚玉带钩是扣覆在一起出土的^[50],两者同时出土的情况亦见于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51]。迄今为止发现的汉晋时期的玉质带扣数量可以枚举,而玉带钩的数目却很多,并且持续时间长^[52]。从两者对比可以看出,中原先民喜用玉来制作本土文化下的带钩,用金银铜等金属来制作外来的带扣,带扣始终未能完全用本土化的物料语言(如玉)加以普及和传承。

考证,本文不再赘述,主要对制器单位“御府”作进一步讨论。

- [5]《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中华书局1962年,第732页。
- [6]卫文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8页。
- [7]《晋书·礼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663页。
- [8]《汉书·刘向传》颜师古注:“尚方,主巧作金银之所。若今之中尚署。”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9页;《通典·中尚署》:“周官为玉府。秦置尚方令,汉因之。后汉主作手工作、御刀剑、玩好器物及宝玉作器。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三尚方。魏晋因之,自过江,惟置一尚方。”中华书局1988年,第759~760页。
- [9]《魏书·李寿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11页;《宋书·顺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94页。
- [10]《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5页。
- [11]《晋书·职官志》中“光禄勋”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页;《通典·中尚署》中“御府”条,中华书局1988年,第759页。
- [12]徐连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1页。
- [13]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29页;《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考古》1959年第8期。
- [14]关于“珉玉”的文献考证,见章鸿钊:《石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69~172页。
- [15]任江:《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 [16][18][50]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 [17]金带扣的工艺可参考杨小林:《中国细金工艺与文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 [19]“金玉同盟”是指东周时期的艺术与文化发展中,金器和玉器在形态与角色功能上的相互借鉴和嬗变,完成金玉互动与结盟的过程。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罗森(Jessica Rawson),见下注。台湾学者又加以进一步演绎探讨,见黄翠梅、李建纬:《金玉同盟:东周金器和玉器之装饰风格与角色演变》,《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 [20] Jessica Rawson, Jade and Gold: Some 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Jade Design, in *Chinese Jad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1996*. Hong Kong: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1997, pp.149~160.
- [21]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
- [22]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 [23]带扣长9.4厘米。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乐浪》,国立中

[1]关于六朝时期的书体演变,可参考阮国林、王晖:《从南京出土墓志看东晋、南朝书体之特点》,载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南京历史文化新探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9~213页。

[2]孙仲汇:《南朝宋文帝白玉袈带鲜卑头考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5~98页;王正书:《上博玉雕精品鲜卑头铭文补释》,《文物》1999年第4期。

[3]张尉:《白玉袈带鲜卑头制作年代辨正》,载氏著《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82页。

[4]张尉对铭文涉及的如官职、名称、工时及文法造句有详细

- 央博物馆2001年,第64页。
- [24]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12页。
- [25]对这件带扣的来源,学者有不同看法,李零将其整理,并根据有翼神兽及造型特点,认为本土说较为合理。见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 [2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36、857~858页。
- [27]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 [28]如出土了铜樽、博山炉、兽面纹玉剑璏、龟钮玉印等汉代常见随葬物,墓主身上有九窍塞玉、玉猪握以及胸口覆盖了大型玉璧,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乐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001年,第64页。
- [29]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省文化厅编:《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 [30]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
- [31]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 [3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 [33]这一时期出土蟬纹金珰的墓葬很多,如王志高等:《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冯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岳涌:《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 [3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 [35]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玉器选萃》,国立故宫博物院1970年,图18。
- [36][49]孙机将其复原成了无扣孔、无扣针,一端为圆首的长方牌饰,见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07、301页。笔者并不同意此复原方式,汉晋时期这种制作精美的圆首长方形大型带扣,均单独使用,与成对的“晋式带扣”并非同一概念。
- [37]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
- [38][46]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 [40]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
- [4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65、211~213页。
- [42]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曹墓》,《文物》1979年第3期。
- [43][48]Jenny F. So and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 62.
- [44]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 [4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 [47]汉时期内蒙古发现的匈奴贵族大型墓,从墓坑建造到棺槨制度,以及随葬品的组合,已与大型汉墓无异,清楚地看出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见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 [51]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盗扰严重,出土共两件玉器,一件龙首玉带钩、一件龙纹玉带扣。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 [52]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南昌市郊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4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汉阳蔡甸一号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4期。

Research on Jade and Gold Buckles of the Period Betwee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CHU Xi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jade buckles in Shanghai Museum originated from the bronze ornaments of the northern nomads while the techniques and crafts were similar to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of the same period. The material selection over jade and the design motifs and patterns, however, were to the taste of the Han people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Han through the Jin Dynasties, the shape of jade and gold buckles transferred from the rectangular one to the one with oval front and square rear. The material, technique, and design of the buckles of this period reflect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Hu peoples.

Key words: Han to Jin Period; buckle; jade; gold ware

(本文终校:黄苑)